

抗美援朝第一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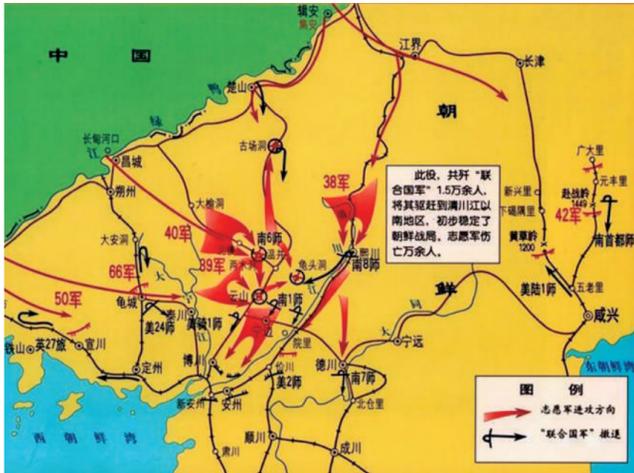
■许正张苗

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期间,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于1950年10月25日在朝鲜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,遭遇并成功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。此战是志愿军赴朝后的首战,打出了国威、军威,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。

将帅抵近指挥,精准捕捉战机。 初战必须审慎、首战务求胜利,乃是领兵作战之铁律。特别是面对占有绝对装备优势的“联合国军”,志愿军入朝第一仗能否取胜,对于打破嚣张气焰、阻敌继续北犯、稳住朝鲜战局、振奋军心士气、展开后续作战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为确保初战即首胜,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带着随行的一名参谋、一名司机和两名警卫员,乘车先于部队入朝以察明战场情况,并于10月21日到达温井西北30余公里处的大榆洞,与金日成面商作战大计。彭德怀先谈了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,即以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第38、39、40、42军等部队约25万人先组织防御,阻敌北进,稳定战局,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,然后等待时机举行反攻。金日成则介绍了朝鲜战局的最新情况,敌军于10月19日占领平壤后气焰愈发嚣张,依仗装备优势快速机动,呈东西两线对进之势向北突进,已抵近或进至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。而朝鲜人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,主力部队基本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,三八线以北能有效掌握的仅有3个师。

在听取金日成关于朝鲜战局的介绍后,彭德怀基于敌军快速推进、我军难以占领预定防御地区的战场实际,判断中央军委先行防御、再行反攻的预定决心已无法实现。经请示并得到中央军委同意后,彭德怀于22日组织随行人员,在大榆洞设立志愿军司令部,迅速调整作战部署,以备敌军东西两线快速北进之势。当首批入朝的118师经5天急行军,于24日晨率先到达大榆洞时,师长邓岳已能听到温井方向传来的



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作战经过要图。

敌军炮击声。彭德怀立即命令第118师在两水洞地区做个“口袋”,相机歼灭由温井来犯的冒进之敌。

部队隐蔽行动,巩固制胜基础。 想要达成作战突然性,夺取作战胜利,不仅需要指挥员敢于抵近侦察、靠前指挥,数十万大军如何做到隐蔽机动、快速接敌也十分重要。同时,两军最高指挥者的行事风格直接决定了部队的行动特点,也最终影响着各自作战行动的成败走向。

为确保入朝第一个战役发起的突然性,志愿军司令部在过江前严令各部队入朝后要控制电台,封锁消息,严密伪装,昼伏夜行,向指定的作战区域隐蔽开进。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依令利用夜暗隐蔽行动,严格执行保密规定,成功躲过了敌军空中与地面侦察。当数十万志愿军进入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时,“联合国军”竟没有丝毫察觉。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麦克阿瑟十分乐观地认为:中国出兵干预的可能性很小。

与我军隐蔽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

是,“敌军异常骄横,如入无人之境”。10月24日,麦克阿瑟下达“总追击令”,命令敌军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鸭绿江突进。于是,敌军各部都以最先到达鸭绿江为荣,纷纷加快进军速度。“联合国军”虽在我军到达前进至我预定防御地区,但因其未发现我军入朝,仍继续大胆前进,使得其自身兵力逐渐分散。其中,敌西线右翼南朝鲜军第2军团态势突出,且与东线部队之间敞开80余公里的缺口。这为我军突然发起作战、翻斤冒进之敌,实现反战制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。

巧设“口袋”阵地,速歼突进之敌。 正因有指挥员靠前指挥,部队隐蔽行动所创造的有利态势,我军才能在未能抢先占领预定防御地区的不利情况下,将原先可能出现的敌我遭遇战,成功转化为我方主动待敌的伏击战,打出入朝作战的第一个胜仗。

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,第118师于10月24日晚以预期伏击姿态占领两水洞及周边的北镇、九龙江、仓洞等地

区,修筑工事,准备阻击敌人。其中,第118师指挥所位于两水洞,下辖的第353团在两水洞公路西侧展开,第354团沿温井至北镇公路和九龙江北侧一线展开,第352团在北镇西北侧展开,扎了个严实的“口袋阵”。

25日9时许,敌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及1个炮兵中队,成两路行军纵队,乘车由温井向北镇疾进。10时许,敌军第3营尖兵连及炮兵中队进入我军第118师指挥所附近,遭我侦察连阻击。随后,敌军第3营全部进入我军第118师预设伏击圈。第118师主力立即采取“拦头、截尾、斩腰”的战法发起进攻。第354团依托有利地形,从侧翼对敌行军纵队发起猛烈攻击,将其后续分队2个步兵连分割成数段,经1小时激战后予以全歼。14时30分,邓岳令第353团第1、第3营各出一部兵力,配合第354团第3营将进至两水洞、仓洞的敌军尖兵连和炮兵中队歼灭。敌军第2团主力为解救其第3营,对我军第354团第2营阵地发起10余次攻击。从25日中午开始,我军第2营官兵顽强阻击,在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,成功击退敌军多次攻击,坚守住了阵地,有力地保证了我军主力的作战行动。战至15时30分,第118师全歼敌军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。至此,围歼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的战斗胜利结束。17时,在得知其第3营已被志愿军歼灭后,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主力停止向第354团第2营的进攻,溃退至温井。

此战,我志愿军共击毙敌人300余人,俘敌160余人,缴获各种枪支163支、火炮12门、汽车38辆。首战胜利的捷报传到北京,毛主席极为欣慰,亲复贺电:“庆祝你们初战胜利”。1951年,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,10月25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。

史说新语

以水佐攻

晋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“以水攻城”战法,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战役。水攻的战术运用为后世的攻城战乃至野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。

面对三家联军的进攻,赵襄子之所以选择退守晋阳,一方面因原居住地耿(今山西河津南)简陋不能御敌,而晋阳控带山河,易守难攻,城墙坚固,城内物资充足。另一方面,赵氏家族长期在此经营,人心向归。

赵氏军队依托城墙工事,坚守数月,联军始终未能攻克。智伯见强攻无效,便利用晋阳地势低洼的特点,改用“以水佐攻”的战术试图攻克晋阳城。汾河为黄河支流,当时正值雨季,水流湍急,它绕着晋阳城顺流而下。智伯让士兵建造堤坝拦住水流,之后命士兵切断所有出入通道,决开河堤引汾水灌淹晋阳城。《孙子兵法》曰:“故以水佐攻者明,以水佐攻者强。”随着晋阳城内水位的不断上涨,军民逐渐失去战斗意志。若非张孟谈及时说服韩、魏两家反攻智伯,晋阳被攻克指日可待。

讽刺的是,在赵、韩、魏三家反攻智伯时,水攻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赵襄子命人决开河堤,放水反灌智伯军队,从而大败智伯。此后,水攻成为战争中的常用战术。战国时期,秦将王贲引黄河之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,迫使魏国投降;楚汉战争中,韩信利用淮水佐攻,大败楚将龙且;东汉末年,关羽水淹七军,威震中原。

伐交致胜

晋阳之战,智伯可谓功败垂成,在水灌晋阳眼见奏效之时,张孟谈成功



晋阳之战示意图。

晋阳之战

■于涌泉

晋阳之战,发生于春秋末期(公元前455年至前453年),是晋国卿族赵氏在晋阳(今山西太原西南)与智氏、韩氏、魏氏联军进行的一场城邑攻坚战。赵襄子暗中串通韩、魏两家倒戈,最终攻灭智氏。而后,晋国领土全部被韩赵魏三家瓜分,史称“三家分晋”。“三家分晋”事件也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由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期的重要标志。

晋阳大战

春秋中后期,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崛起,其中赵、韩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六家最为强大。之后,赵、韩、魏、智四家在内部兼并战中消灭范氏与中行氏。经过这一系列内讧,晋国实力逐渐衰落,霸主地位被崛起的赵国夺得。

对于传统霸主晋国而言,这是莫大的耻辱。作为晋国势力最大的智氏,其家族首领智伯担任晋国执政后,为重振晋国霸业并削弱其他三家势力,便提出四家分别向晋公献出一个万户城邑。智伯率先献出城邑,韩、魏两家家族首领韩康子和魏桓子迫于智伯的权势不得不就范。然而,早与智伯有隙的赵氏家族首领赵襄子拒绝献出城邑,晋公命智伯联合韩、魏两家讨伐赵襄子。面对三家联军,赵襄子选择退守至城池坚固、物资充足的晋阳。

智伯率联军抵达晋阳后展开了攻城战,赵襄子坚守不出,联军的强攻未能奏效。于是,智伯一方面命军队包围晋阳城,另一方面下令决开汾河,灌淹晋阳城。由于长期被困,加之遭遇水灾,晋阳城内军民伤亡惨重,战斗意志愈发动摇,形势十分严峻。危急时刻,赵襄子派家臣张孟谈偷偷出城游说韩康子、魏桓子,说服二人与赵襄子联手,共同对付智伯。赵襄子趁夜色派军杀守智军守堤官吏,决堤放水反灌智伯军队。智军因忙于救水而陷入混乱。赵、韩、魏三家军队趁机夹击,大败智军,智伯和智氏家族数百人被杀,其封邑尽被瓜分。晋阳之战后,晋国再也没有可以与韩、赵、魏相抗衡的力量,三卿便毫无顾虑地瓜分晋国领土,晋国国祚也成为傀儡,再无半点权威。

运用楔子战略,说服韩、魏两家与赵襄子联手进攻智伯。此次纵横捭阖,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,赵襄子死里逃生,而实力最强的智氏反被三家联手消灭。这一事件反映了伐交的威力。所谓伐交,是指通过破坏敌方与其他方面联合的方式,削弱敌方势力,为己方的胜利创造条件。

智伯引水灌城后,晋阳已再难坚守。在此绝境下,张孟谈偷偷出城劝说韩、魏两家倒戈。张孟谈见到韩康子、魏桓子后,用“唇亡齿寒”的故事,道出一旦赵氏灭亡,下面就会轮到韩、魏两家的道理。事实上,韩、魏两家早对智伯的专横和刻薄寡恩颇有微词,加之韩、魏两家担心日后遭遇与赵氏同样的下场,所以接受了与赵氏结盟的提议。

智氏族人智过见微知著,曾提醒智伯韩、魏两家可能反水,建议他杀掉韩康子和魏桓子以绝后患,智伯不听。于是,智过又建议智伯,以重贿收买二人身边的谋臣劝说其主不要反水,并允诺消灭赵氏后赠予他们一个万户城邑。智伯听了不以为然,认为韩、魏两家和智氏一同攻打赵氏几年,要反早就反了,怎么会在马上攻克晋阳之时突然反戈,就未采纳智过的建议。本有机会避免这一大祸的智伯,因为刚愎自用,为自己和族人自掘了坟墓。

《孙子兵法》将伐交的重要性列在伐兵与攻城之前,这是因为伐交的成败可显著改变我双方的力量对比,从而对战争的结局产生直接影响。成功的伐交可以尽可能壮大我方阵营,削弱敌方力量,从而为伐兵与攻城的胜利提供保障。伐交的成功,不仅要依靠实施者的智慧与口才,还要明确对方的需求,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争取盟友或分化敌对联盟。此战中,张孟谈凭借有针对性的话术成功说服韩、魏两家,成为晋阳之战最后的胜负手。

相关链接

楔子战略

楔子战略是政治和军事领域一项常用的战略,即通过各种资源和手段阻止敌对联盟的形成,或分化瓦解已形成的敌对联盟,减轻己方所面临的战略压力,为最终胜利创造条件。在战争中,楔子战略是《孙子兵法》伐交思想的具体运用,战国时期的“合纵”“连横”策略的实施中便包含着大量楔子战略的运用。张仪分化齐楚联盟,帮助秦国重创楚国;郭子仪分化回纥与吐蕃的联盟,说服回纥退兵,成功守住长安。

八路军和新四军各有哪些臂章?

■徐平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,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,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,部队编制、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和服装、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。说起八路军、新四军的识别标志,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臂章和帽徽。八路军、新四军的臂章为长方形,佩戴在军衣左袖上部部位。人们最熟悉的八路军、新四军臂章莫过于“八路”和“N4A”,但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过多种版式的臂章。

八路军常见臂章：“八路”和“18GA”

最早的八路军臂章规格为8.5×6.5厘米,采用白色麻布底,蓝色印制,中间有“八路”名称。之后的臂章在此基础上,中间套了一个椭圆形框。1938年,八路军臂章下方增加“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年度佩用”字样,背面加盖有所属部队的印章。1939年,八路军臂章规格改为8.6×5.8厘米,正面中间印“八路”二字,下面印“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年度佩用”,背面印“尽忠职务、严守纪律、实行主义、完成革命”。八路军臂章有印佩戴年度的,也有不印佩戴年度的。早期“八路”的字体都是楷体,后期多为美术体。臂章书写顺序最初为左书,后改为右书。

1937年9月11日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战斗序列将“第八路军”改番号“第十八集团军”,朱德为总司令,彭德怀为副总司令。9月14日,朱德、彭德怀发布关于“第八路军”改为“第十八集团军”的通告。此后便制作中文数字“十八集团军”臂章,其规格大小、图案设计与1938年八路军佩戴的臂章基本相同,仅将中间的“八路”二字改为“十八集团军”,背面有师别、职别、姓名、编号等栏。在抗战中后期,八路军许多部队佩戴当时国民革命军统一的标志,在臂章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和符号表示“十八集团军”,即“18GA”(GA表示集团军)。还有一种简易的“18GA”臂章,不带蓝底和椭圆形白框,只有“18GA”字样和佩用年度。臂章的书写顺序为中文数字一般为右书,阿拉伯数字均为左书。

除上述统一配发的“八路”和“第

八集团军”臂章外,八路军所属部队也制发了多种臂章,其样式基本与八路军臂章相同。1938年12月,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“八路军山东纵队”,曾制作佩戴“山纵”臂章。1939年11月20日,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共产党领导,改称“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”(以下简称“平汉纵队”),曾制作佩戴“平纵”臂章。1940年6月7日,平汉纵队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10旅,开始佩戴统一的“八路”臂章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八路军番号没有立刻取消,八路军臂章继续使用。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,会同当地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,于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,改戴东北民主联军臂章,其式样、格式与八路军臂章相同,只是改为“东北民主联军”字样。1946年以后,各地八路军番号取消,八路军臂章不再使用。

新四军常见臂章：“N4A”和“新四军”

新四军曾佩戴过多种图案和文字的臂章。1937年10月,新四军宣布成立后,当时只有军部,部队还没有集中整编,所以并未像八路军那样配发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制式臂章。后来,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在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指示下,开始设计新四军臂章。图案为一名身背斗笠、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,左下角书写“抗敌”二字。臂章表明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决心,得到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。于是,用木刻印制该图案的臂章被新四军指战员佩戴,这

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。

随着新四军队伍发展壮大,叶挺等人又指示设计新的新四军臂章,以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。新臂章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,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“N4A”。N是英文NEW(意为新)的首字母,4代表中文“四”字,A为英文Army(意为军队)的首字母。新臂章右下方标明“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年度用”,即1939年使用。

此后,新四军开辟皖南、皖东、江南、苏北等抗日根据地,队伍进一步壮大。1940年,版画家马达设计了新臂章。其正中是一名战士双手持枪拼杀,上方加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字样,左下方为“抗敌”二字,右上方标明“1940”。

1941年初,皖南事变发生后,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,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的美术工作者庄五洲受命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。他借鉴1939年“N4A”臂章,并参考八路军臂章样式,设计出图案为“N4A”底衬白色椭圆、上方左右角各加一个五星、中间标有“1941”字样的新

链接历史